



[李博 著]

体系积累周期视野下的 中国与世界：历史及其延续

TIXI JILEI ZHOUQI SHIYEXIA DE
ZHONGGUO YU SHIJIE : LISHI JIQI YANXU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李博 著]

体系积累周期视野下的 中国与世界：历史及其延续

TIXI JILEI ZHOUQI SHIYEXIA DE
ZHONGGUO YU SHIJIE : LISHI JIQI YANXU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体系积累周期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及其延续 /
李博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117-3012-1

I. ①体… II. ①李… III. ①资本积累—经济周期理
论—研究 IV. ①F034②F0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06327号

体系积累周期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及其延续

出 版 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董 巍

责任编辑：曲建文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字 数：255千字

印 张：16

版 次：201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摘 要

2007 年因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重新激活了学术界对经济危机理论的讨论。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此次的学术交锋中,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在对危机根源解释上的闪烁其辞引发了自身的“理论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周期理论的价值得以再次彰显,国内外涌现出大量具有创新价值和理论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大多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强调金融化在触发当前危机中的核心作用;部分学者甚至由此断定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现实地看,金融化的确构成了 20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但从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和演变所做的详尽的历史梳理来看,金融扩张并不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而是自世界资本主义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萌芽以来,不断地周期性重现的现象。阿瑞吉进一步地将这种周期性现象进行理论化的解读,构建起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理论。该理论也构成了本文的理论基础。

体系积累周期理论以资本积累为中心,体系规模的资本积累进程则由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地位的国家(政府)及企业所组成的综合体所推动。每一个周期按资本积累方式和积累来源的不同可划分为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阶段;并且在每一个阶段的结束阶段都将发生显著的危机。具体而言,在物质扩张的结束阶段,将发生一次“信号危机”。信号危机的爆发表明贸易和生产领域已经不能将资本积累进程继续向前推进,因而积累的主要方式从剥削式积累向剥夺式积累转化,资本活动的主要领域从物质扩张向金融扩张转化。这种转化,一方面使现有的积累中心能够把对自身霸权形成挑战的竞争加剧的负担,转嫁到国内外从属群体的身上,从而延续了当时的积累周期;另一方面,这种转化并不是对当时积累体系矛盾的解决,只是延缓和恶化,其结果就是在金融扩张的结束阶段爆发该周期的“临终危机”。这一危机

与“信号危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将导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秩序的崩溃。体系秩序的重建要求体系结构和权力分配在世界范围内的重组，形成新的积累中心、体系秩序和积累机制。正是通过这种前后相继的体系积累周期，资本主义从中世纪末期在西欧萌芽以来，已经延续了5个多世纪。因此，要对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矛盾总爆发的危机做出透彻的理解，就必须从历史和体系的层面来展开；并且分析的范围也将超越单纯的经济层面，涉及政治和经济及其他社会历史进程的互动。

因而，在本文的写作框架中，当前的危机，甚至危机本身就成为一个切入点，文章的主要内容也相应地转换为以体系积累周期为中心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历史进程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对当前危机根源的探讨则包含在周期分析之中。作者期待这样一种分析路径在揭示危机的动因和未来发展趋势方面，其收益能够更甚于对某一次危机单独展开的分析，也期望通过这种方法，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周期理论中增加一种新的视角。

围绕上述内容，本文主要按照以下两条逻辑线索展开：一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各周期中，资本逻辑—领土逻辑（或者经济逻辑—政治逻辑）在不同阶段的融合、冲突与矛盾关系。通过这种辩证的互动，在每一个体系积累周期中都形成了特定的积累中心及其起主导作用的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这种综合体而非单纯的资本主义企业推动着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最终使之从西欧之一隅发展为一种全球性的存在。在论文的第3章中，我们对历史资本主义前三大体系积累周期中各自形成的这种综合体及其积累战略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对其演变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揭示。通过这一过程，资本逻辑（资本权力）逐渐凌驾于政治逻辑（国家权力）之上，将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转化为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张的工具。而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中则将这种分析运用于对美国和中国积累体制的分析，并着重指出了中国积累体制的独特性。

另一条逻辑线索以资本积累为中心展开，也是本书对体系积累周期理论中缺失环节所做的理论补充。虽然阿瑞吉的资本积累理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但其理论体系却更多地受主要作为历史学家的布罗代尔的启发。因此，在阿瑞吉对资本积累的相关分析中，其深度和力度都出现了倒退。在涉及体系内跨国界的资本转移时，主要通过论证资本的“灵活性”和“兼容性”来解释，与沃勒斯坦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三层次模型比较起来都显得薄弱。对于不同阶段资本积累机制、积累方式的变化和积累中心的转移

如何实现等缺乏系统的分析。在本文的第4章中，我们以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为基础，对体系积累周期各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积累方式、积累机制，以及从一种方式向另一种方式的转移逻辑，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理论上的补充和完善。

本书将资本积累划分为剥削式积累和剥夺式积累两大类，其中剥削式积累又分为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国内剥削和主要通过不平等交换进行的国际剥削两种。它们构成了英国体系积累周期及之后物质扩张阶段最主要的积累方式。对于国内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尤其是伊曼纽尔、阿明和弗兰克等学者则对国际剥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本书在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不平等交换的数理模型，在更一般化的条件下讨论了外围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向中心国家进行的剩余转移。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体系积累周期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但不能很好地解释体系向外部的扩张，我们的理论补充则较好地解释了这种扩张的机制。在第4章中，还通过对金融资本变化多端的行为的分析，实现了体系积累周期理论与新熊彼特长波理论的协调。一方面弥补了体系积累周期理论对技术进步的忽视，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新熊彼特长波理论的适用范围。在该章的其余部分，则讨论了建立在武力和殖民主义基础上的剥夺式积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类剥夺式积累被称为“原始积累”，具有资本主义“史前史”的性质，但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它是与资本主义相伴始终的。

第5章集中于对美国体系积累周期的考察，是前述两条逻辑线索的进一步展开。在分析当前经济、金融危机的根源时，着重强调了金融化剥夺机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与现有多数针对当前危机的研究成果不同，我们坚持在对当前危机的性质和根源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中，必须从体系和历史的角度来展开，对金融化进行解读时也同样如此。在本章的最后，依据金融剥夺的不可持续性得出了当前危机很可能是美国体系积累周期“临终危机”的结论。

文章的最后一章则聚焦于对中国崛起以及世界体系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上。它以中国为中心，但是将中国经济的发展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之下而得以展开。一方面，我们希望从这种视角出发，能够更加全面而客观地审视这个国家，在以积极的姿态参与现代世界体系30多年后的成败得失中。既强调中国资本积累进程中有别于西方资本积累的内在特性，

也分析了中国在与世界体系发生联系时其积累体制所经历的深刻变化，以及由之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产生的相关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多年、改革开放 30 多年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发展中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阿瑞吉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改变当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积累机制而走向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格局的关键性力量。在文章的结束部分，我们将回到这一命题，但与阿瑞吉不同的是，本书提供了一种建立在区域化基础上的世界体系来作为对当前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替代，以响应其创建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体系的倡议。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一、选题背景	1
二、研究目的、内容	4
三、文章结构	10
四、研究方法	12
五、本书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12
第二章 危机、周期、资本积累与体系积累周期	14
一、马克思的危机和周期理论及其遗产	18
二、马克思主义危机和周期理论史	24
三、世界体系理论概观	29
四、沃勒斯坦的周期和趋势理论	42
五、阿瑞吉——体系积累周期	48
第三章 历史资本主义的三大体系积累周期	62
一、资本的崛起与热那亚体系积累周期	63
二、现代国际体系与荷兰体系积累周期	78
三、工业、帝国和自由贸易：英国体系积累周期	91
第四章 体系积累周期演进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110
一、扩大再生产模型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	112
二、技术革命与体系积累周期	119
三、不平等交换与国际剥削	139
四、剥夺式积累	148
第五章 美国体系积累周期与当前的危机	152
一、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	153

二、美国周期的积累战略	155
三、美国周期的物质扩张	162
四、美国周期的金融扩张与当前的危机	170
第六章 世界体系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193
一、东亚与世界——一个历史的分析	195
二、中国的资本积累：1949-1978	203
三、中国崛起的根源：1978-2012	210
四、经济成功的社会矛盾：资本积累的视角	223
五、中国与世界体系	228
参考文献	231
后 记	243
致 谢	245

第一章 导 论

一、选题背景

20 世纪带给人类的是一个动荡的结束和不确定的未来。在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看来，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一个普遍危机或全球危机的时代，90 年代初则宣告了世界历史中一个纪元的告终，留给世人的是“一个政治变幻、不稳定、混乱和内战的广阔地带”^①。虽然新的一幕可能正在开启，但除了明显感受到的危机的气氛，政治的未来并不明朗。^②“当时代末尾的公民笼罩在迷雾中，探着路走向第三个千年时，所有人都肯定知道一个历史时代已经结束，但除此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知。”^③与霍布斯鲍姆的悲观论调比较起来，有些人则要乐观得多。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带着一种狂热的语气宣告，终结的不是一个时代，而是历史本身；终结不是在混乱与危机中发生，而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中完成。^④

今天看来，福山当初自信满满的结论就像是一个并不高明的“黑色幽默”，历史远未终结。自由资本主义在赢得冷战的胜利并迎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短暂的“新经济”繁荣之后，危机便接踵而至。霍布斯鲍姆的预言不幸地变成了现实。先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地带，从墨西哥、阿根廷和

①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Vintage, 1994, P.9–10.

②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Vintage, 1994, P.7.

③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Vintage, 1994, P.558–559.

④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俄罗斯开始，接着横扫东南亚各国，“成就”了所谓的亚洲金融风暴。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间坐标看去，上述的危机不过仅仅具有预演的性质。跨入新世纪便是更加动荡的十年，它直接冲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此情此境，极容易让我们想起熊彼特五十多年前那个著名的带有悖反性质的两点论，即“资本主义制度实际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业绩是如此宏伟，否定了关于这一制度将在经济失败的压力下垮台的看法”；但是，“恰恰是它所取得的成功，破坏了保护它自身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创造了使自己无法存活的条件”。^①在熊彼特写作的当下，他的第一个论点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其时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经历其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危机，无数的人正为重振这个混乱的世界焦头烂额；但真正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还是第二个论点——资本主义会因为它的成功而走向最终的失败。战后的历史已经验证了熊彼特第一个论点的正确性；而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很可能正在证实他第二个观点的正确性。

“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以一种异于以往，也更为极端的方式展现了这一体系运转的脆弱性。从繁荣到危机的转换可以如此迅捷。它直击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使得美国身处两大洋之间，洲际规模的“孤岛”位置所提供的天然安全保障已经不那么可靠。自“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本土所遭遇的这次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将那幅“全球化”图景所描绘的美好未来击得粉碎。的确，资本主义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进步。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他即感叹“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②。今天的人们可以带着更加昂扬的语调宣告，在最近的几十年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几百年间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但这仅仅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方面，在另一面是世界不同地区间财富和权力分配的极端不平等，以及由这种加剧的不平等所引发的仇恨的积累。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体系并未因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而真正“变平”，鸿沟反而进一步加大。恐怖主义行径当然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地去追问是什么产生了恐怖主义的温床的时候，对“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维系当

①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4, P.6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1页。

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合法性基石的拷问,就显得顺理成章。

“9·11”事件本来可以促成对此的反思,但事实的发展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美国当局的新保守主义群体利用这一事件所激起的美国民众普遍的恐慌气氛,推行其“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政策。这一政策以“失败国家论”和“新帝国主义论”为理论先导,以重建“美国新世纪”为目标,先对阿富汗,接着对伊拉克的占领成为其首要的军事行动。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看来,在伊拉克展开的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使用武力,在未来50年或更长时间内建立美国对全球石油龙头乃至全球经济的控制”^①。其直接的目的,则在于通过新一轮的军事扩张,扭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恶化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和资本过剩积累的危机。在这之前,美国已经先后利用《广场协议》向德国和日本、利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向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转嫁了这一危机。然而,战争的胜而不利并没有为“美国新世纪”带来一个良好的开端。一场未能带来盈利,甚至不能保证自给自足的战争使得美国不惜以动摇美元霸权为代价,通过过度金融化来化解日渐显现的衰退趋势。

一种被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里卡多·贝罗费奥里(Riccardo Bellofiore)称为“金融化了的凯恩斯主义”在“9·11”事件之后不久被推上前台,其目的在于缓和“不断在加深的衰退”。格林斯潘开始鼓励金融市场变本加厉地提供各种借贷,甚至向那些缺乏偿还能力的穷人们进行大规模的借贷。马丁·沃尔夫对这一政策提供了一种解释:“美国家庭的支出必须超过他们的收入。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除非其他方面有所改变,否则经济将会陷入衰退。”事实是,其他方面确实发生了改变,例如在阿富汗,接着在伊拉克先后展开的占领行动,但这些变化无一例外地都向更坏的方向发展,对于扭转正在逼近的衰退不仅于事无补,反而雪上加霜。于是,“只有金融泡沫才能阻止衰退较早发生”^②。

从短期来看,美联储成功地做到了延缓衰退的发生;从中期来看,美联储和布什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完全无法化解整个体系中存在的根本性矛盾。危

① [美]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② [英] 克里斯·哈曼:《次贷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4期。

机必将以更具破坏性和颠覆性的方式呈现——在 2007 年的末尾，它初露端倪。一开始，它被技术性地命名为“次贷危机”。这一命名显示了决策系统在最初试图让人相信这不过是一场发生在“次级债务”领域的局部性危机，其性质与 1998 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盘比较起来并不会严重很多；随后，整个银行和金融系统受到拖累，名称随之被改为“金融危机”；几个月以后，有人开始小声嘀咕，问题可能搞大了：是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

于是乎危机问题再次成为理论界与政策面关注的焦点。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此次的学术交锋中，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在对危机根源解释上的闪烁其辞引发了自身的“理论危机”，处于非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周期理论的价值得以再次彰显。正是这双重危机构成了本书写作的背景条件。对危机的分析，对有关危机的理论所展开的评述则构成写作的基本出发点。

二、研究目的、内容

1. 研究目的

就本书的写作计划而言，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次贷危机”，甚至危机本身都仅仅是一个切入点。因为我们体认到，只有将世界范围内的整个历史资本主义视为一个整体才能获得对于作为体系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深刻认识——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更是对其长期发展趋势的洞见。要获得这样的认识，单纯从经济层面展开分析很难达到目的，因为经济过程总是“嵌入”政治、文化、生态和其他社会历史进程之中；要获得这样的认识，局限于对某一次危机根源、特征的探讨，不管这种讨论多么接近于事物的本质，也只能是不见森林而只见树木的片面之论；基于类似的理由，我们相信，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展开的分析同样具有类似的缺陷。

这意味着分析必然在长时期、大范围的历史—空间视角下才能得以展开，并且其分析的范围也将远远超越单纯的经济层面。然而在另一方面，要对这些相互联系和互动的社会历史进程进行全面的考察已远远超出作者的能力。因此，本书的研究路径实际上是一种妥协或折中：一方面力求避免主流

经济学范式中流行的形式主义倾向^①，以历史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趋势和空间扩张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将分析的范围限制在能够操作和便于理解的层面——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分析将成为整个文章的核心部分。文章中涉及的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的考察则完全是概略性的，并有选择地按照文章的逻辑需要来组织。其主要目的不过是为了加深我们对当今世界格局之由来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解。作者期待这样一种方法产生的收益能够更甚于对当前危机单独展开的分析。

这也正是乔万尼·阿瑞吉^②曾经采用过的策略。他从布罗代尔处获得灵感，选择一个狭小的焦点，“把他提供的十分丰富的设想和阐释，整理加工成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崛起和全面扩张的一个简洁的、前后一致的和言之有理解释”^③。通过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个生命周期划分为便于操作的分析单位——他将之命名为“体系积累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阿瑞吉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分析。他最为重要的著作《漫长的20世纪》已被普遍认为是当代致力于世界资本主义长时段研究的扛鼎之作。^④

通过这一分析性概念，阿瑞吉将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加工整理成部分重叠但又前后相继的4个周期：（1）热那亚周期，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2）荷兰周期，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3）英国周期，从18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4）美国周期，从19世纪末一直持续到现在。伴随周期

① 这一倾向，在方法论上依然固守启蒙时代的机械决定论，按照具有机械还原论性质的“理性—个人主义—市场均衡”的逻辑展开其论证，并将经济活动从复杂多样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抽离出来，构建其“市场的神话”；在具体的方法上则把数学化视为普适的，甚至唯一的科学方法，并由此建立起由之支配的单一学术规范。在国外的经济学研究中，这样一种倾向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反思和批评，但对于中国经济学界而言，却是方兴未艾；当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兴起声势浩大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时候，我们还在忙着和国际接轨，固执地按照新古典的范式对国内现有经济学教学体系推行“全盘西化”。

② 国内对于 Giovanni Arrighi 的翻译很不统一，在《漫长的20世纪》中被译为杰奥瓦尼·阿瑞基，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被译为乔万尼·阿里吉，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又被译为乔万尼·阿瑞吉。本书在行文中统一使用乔万尼·阿瑞吉这一译法，但在直接引用和标注时候遵从原书中文译者的译法。

③ [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与致谢。

④ [美]汤姆·雷弗：《乔万尼·阿瑞吉——资本的绘图师》，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3期。

的更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空间上从欧洲一隅扩张到今天的全球规模，在时间上则从中世纪末期延续至今，已经历 500 多年周期性的兴衰和变迁。^①

他自谦他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在布罗代尔的世界资本主义概况里，“添加一点逻辑一致性、增加几句话”。但事实上，他宏大的理论建构已经大大拓宽了我们观察当前危机的视野，能够把今日之全球动荡置于广阔的历史地理视角之下进行分析；他所采用的世界体系视角——在方法论上继承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大范围的分析方法，在理论立场上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态度，都使得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远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深刻，从而超越了那些看似雄心勃勃的寻求危机“终极”解释的努力。对此，在英刊《新左翼评论》第 60 期（2009 年 11-12 月号）刊发的雷弗撰写的纪念阿瑞吉的文章中曾做出如下评价：“在他关于资本主义长时段的持续考察中，从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起源时代到现代，大概没有任何一位知识分子能对当前的危机做出比乔万尼·阿瑞吉更深刻的分析。”^② 此言不虚。

阿瑞吉对资本主义数百年的扩张历史所做的深入且具有说服力的分析，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体系的特征、性质和长期趋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漫长的 20 世纪》中，阿瑞吉系统地提出了“体系积累周期”理论；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这一多位作者共同完成的著作中，先前被忽略的“阶级斗争和世界经济在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两极分化”、反体系运动以及世界体系中的文明层面的分析则获得了应有的分量，从而弥补了《漫长的 20 世纪》中的缺失；作为前述两部著作的续集和延伸，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 世纪的谱系》一书中，阿瑞吉将研究的重点投向了当下和未来，集中论述决定着当前体系走向的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成中两个最为重要的过程：一个是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出现与消亡，另一个是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复兴的领导者。阿瑞吉宏阔的三部曲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走向纷繁复杂的现实，而这现实正是我们参与其间的现实。

① 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时间起点上，世界体系理论各主要作者的意见并不统一。阿瑞吉与沃勒斯坦之间就存在分歧。阿瑞吉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并非起源于 16 世纪的欧洲内陆，而是起源于 13-14 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在当时，通过资本主义（热那亚资本）和封建国家（西班牙霸权）之间的结盟，世界体系进行了区域性的预演。

② [美] 汤姆·雷弗：《乔万尼·阿瑞吉——资本的绘图师》，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 年第 3 期。

因此，正如阿瑞吉曾经谦称的那样，本书作者也力求能在阿瑞吉所创建的宏大的理论体系里“添加一点逻辑一致性、增加几句话”；另一方面，我们更希望能够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出发，理性地看待这个国家在以积极的姿态参与^①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30 多年后的成败得失，评估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发展中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能够对这一体系的长期发展施加何种积极的影响。这后一问题，既关乎我们在导论的第一部分所论到的熊彼特在 50 多年前所做出的那个预言可否实现，更是阿瑞吉的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21 世纪的谱系》一书中思考的出发点。在他去世之前，他孜孜关注的是“在考虑到所有不足以及未来可能的挫折的情况下，中国的崛起是否可被视为 230 年前斯密所预言并倡导的欧洲民族以及非欧洲后裔间更大的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先兆，以及在何条件下可被视为此先兆”^②。当前学界有关“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热烈讨论亦可视为对此问题的遥相呼应。我们则希望能够站在一个中国经济学人的立场，以阿瑞吉提供的理论对其留下的问题做出解读，通过“重新回到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的讨论上来”，以“响应其创建一个更人道的世界体系的理想”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这位杰出思想者的敬意。

2. 研究内容

本书从阿瑞吉的三部主要著作（《漫长的 20 世纪》、《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和《亚当·斯密在北京——21 世纪的谱系》）中获得启发。具体地

① 在世界体系理论中，外部地区（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需经历三个阶段：处于外部地区、被融入和被边缘化。融入是指把某个地区“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轨道内，使它无法再脱离。边缘化包含着使该地区的微观结构发生持续不断的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力渗透，同时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政治体制和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因此，在世界体系理论的框架中，“融入”和“边缘化”具有特殊的理论含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广泛地参与到世界体系的经济和政治交往活动中，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自身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方式与其他被“融入”到世界体系内的国家和地区比较起来，都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此，我们选择用“参与”一词作为“融入”一词的替代，以体现中国以积极主动的方式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联系时的这种独特性。

② [美]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 世纪的谱系》，黄平、路爱国、许安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82 页。

讲，本书以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和资本积累的危机为研究线索，将中国经济的发展放在世界体系的宏观背景之下，以回答下述问题为研究的基本内容。

（1）如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可按照体系积累周期进行划分，那么作为周期划分标志的体系积累危机的形成机制是怎样的？

（2）体系积累周期的变迁，伴随着霸权更迭、阶级关系的动态调整、技术进步、经济组织方式等的动态变化。那么，这些调整如何服务于积累中心的资本积累，或者以怎样的方式缓解了资本积累的危机，但最终又不可避免危机以更大的破坏性爆发？

（3）动辄上百年的体系积累周期与通常持续 50 年左右的经济长波以及更短的经济周期波动如何协调？如何理解体系积累周期与通常的经济长波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将技术创新纳入到体系积累周期模型中去。

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书的理论建构部分。

在沃勒斯坦的著作中，已经可以发现以资本积累为线索展开的对资本主义体系周期性变化的论述，然而并未形成系统的危机和周期理论，只是散见于其著述的不同部分；乔万尼·阿瑞吉则直接将体系积累周期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并做出了富有新意和洞察力的解释。然而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阿瑞吉所创建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的缺陷仍然是明显的。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阿瑞吉流于笼统地谈论资本积累。虽然阿瑞吉的资本积累理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但其理论体系更多地却是受主要作为历史学家的布罗代尔的启发。因此，在对资本积累的相关分析中，其深度和力度都出现了倒退。在涉及体系内跨国家的资本转移时，主要通过论证资本的“灵活性”和“兼容性”来解释，与沃勒斯坦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三结构模型比较起来都稍显薄弱。第二，阿瑞吉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国家间的霸权转移和商业企业因应霸权更迭而进行的重组和变革上。这样一种选择使他能够在沃勒斯坦的霸权周期和他的体系积累周期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将其分析延伸至政治—经济层面，但技术变革在其间发生的作用出人意料地被忽略了。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体系积累周期的理论框架无法和长波理论，尤其是与熊彼特开创的技术创新长波理论相协调。^①毫无疑问，作为体系层面

①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长波研究复兴中形成了三个影响较大的长波理论派别，即由熊彼特开创的技术创新的长波理论、曼德尔构造的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及由戴维·戈登等提出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和调节学派。